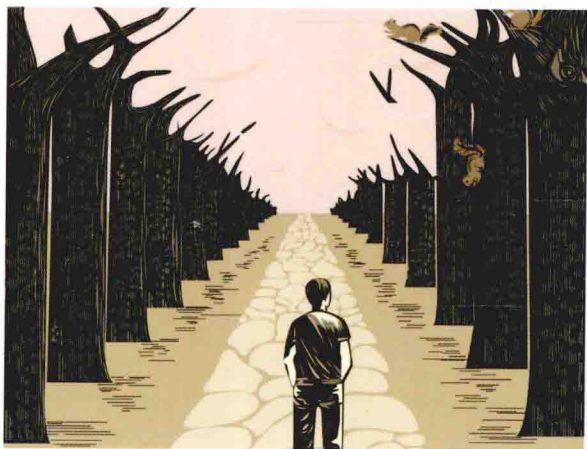


此情堪忆

——萧乾心灵地图

萧乾——著



一个性格腼腆、从未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间碰到一个走南闯北、饱经世故的江湖客。关于他又有种种骇人的传闻。然而姑娘还是身不由己地跨上他那匹马，跟他奔驰而去。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萧乾

此情堪忆

——萧乾心灵地图



萧乾——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情堪忆：萧乾心灵地图 / 萧乾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04-5097-6

I. ①此… II. ①萧…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萧乾
(1910～1999)—回忆录

IV. ①I247.7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7651号

此情堪忆：萧乾心灵地图

作者：萧乾

责任编辑：冀晖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35mm×965mm 1/16

字数：220千字 印张：17.75

版次：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5097-6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我与萧乾的文学姻缘（代序）

文洁若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随笔，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持的，《国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经由清华外文系毕业，在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

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到第五次还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因为原来是直译的，佶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工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所以是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归侨郭开兰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译，完全可以这么译。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以不改为宜。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十九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二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八十万部，一九八〇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萧乾告诉我，自己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是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时也能更贴近原作。

三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怆的，译出后引不出同样的感情，再忠实也是不忠实。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长的二十二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才搞翻译。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

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人。

四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小时，便写出一篇三千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词是“team work”（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务，就共同协作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词。他小时看见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文洁若，翻译家，作家，萧乾夫人）

目 录

辑一 师友交往

热爱台湾的龙应台 / 3

台湾有家夫妻店 / 6

湖北人聂华苓 / 9

寻根者叶维廉 / 15

浅予率真 / 26

想当初，胡乔木 / 29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 / 32

海伦·斯诺如是说 / 42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 / 63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 / 67

一代才女林徽因 / 73

悼健吾 / 83

哭亡友曹维廉 / 86

世纪大姐 / 89

大姐的梦 / 91

忆冰季 / 92

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 / 94

河口遇险 / 109

——并怀施公蛰存

默默的奉献者 / 112

——庆于道泉兄九十寿辰

悼老报人成舍我 / 115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 117

辑二 亲情爱情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 139

我们这家夫妻店 / 142

我的书房史 / 146

我这两辈子 / 150

校门内外 / 157

离歌唱给文洁若（家书选辑）/ 180

三姐常韦 / 198

辑三 足迹经历

足迹篇：香港 / 221

啊，汕头，我的第二故乡 / 225

童年的梦 / 230

怀念上海 / 232

从长沙到沅陵 / 235

我失过业 / 237

五福堂 / 241

美国点滴 / 244

负笈剑桥 / 259

北欧来鸿 / 270

辑一 师友交往

「饼干」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冰心



□ 热爱台湾的龙应台

——评《野火集》

年初在香港，偶然从那里中文大学吴瑞卿小姐的书架上，翻到台湾龙应台的两本近作。一本《龙应台评小说》已见于今年二月号的《读书》。然而为她惹出乱子的却是她的《野火集》。

《野火集》是她两年前在台北《中国时报》打擂台纪录。据出版者说：“短短的一年中，她就像野火般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造成‘龙应台旋风’。她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无畏地揭开中国人社会的种种病象，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张大眼睛去看，去反省，去深思。或许她的意见刺痛了我们民族的自尊，戳破许多神话，揭露了无数疮疤，可是《野火集》正想烧去一切腐朽，一切丑陋，一切不义不公，锻炼出一片清明天地。”

书接连印了一百版，销了二十万册，真是不胫而走。然而对她耿耿于怀的人也与日俱增。

她的第一炮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头，她先讲了台北的一件小事：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接着，她又指陈：“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她列举了台湾街头巷尾种种不文明的事。她也问过受害者为什么不抗议。他们说：“不敢呀！会动刀子的。”又问为什么不报警，回答是，他们狼狈为奸，通着的。“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第二一三页）

她打心头里恨的，正是这种容忍。她大声疾呼：“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一权利生气的。”（第三页）

在讨论中，有位叫罗肇锦的读者说：“中国人当然不生气……”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第七页）

这恰好是龙应台攻击的目标。她说：“‘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事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就都可以被原谅了。”（第四页）龙应台认为“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第十一页）

龙应台反对满足于洁身自好。她认为“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第十六页）

龙应台对台湾生气的，不仅仅是摊贩在骑楼上烧水洗锅，在不许吸烟的公共场所照样吸烟。迫使她生气的还有用标语口号代替实际行动的形式主义。为了“复兴中华文化”，“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美国）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上一亿元以上……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

了”。（第六十四—六十五页）她认为台湾在许多事上是“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第六十五页）她说：“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第六十七页）

她十分讨厌那种安于现实的“自慰心理”。动不动就给批评者扣上“外国的月亮圆”这么一顶崇洋帽子。“当然有些国家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第二二四页）

她还反对把“国际形象”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认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不应仅仅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第一〇五页）文明得是切切实实的。

龙应台于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专攻英美文学。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她说：“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辱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第十七页）“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第十八页）

由鲁迅奠基的伟大“五四”运动一个可贵遗风，就是作家不讳疾忌医，敢于正视现实。对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敢于剖析并鞭笞。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杂文昌兴，至今不衰。读毕此书，我深感龙应台了不起，她是真正热爱台湾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 台湾有家夫妻店

出版社真会琢磨花样！几年前出了几套《双叶丛书》，作者都成双成对：一边儿是太太的，另一边儿是先生的。而且这两边儿都是封面，不分正反，意思大概就是表明男女平等吧。先出的内地八对：四对活着的，另四对大致都已不在世了。如今又发展到台湾去啦。打头阵的就是《城南旧事》的作者（和主人公）林海音和她的先生——著名记者何凡。三十年代他们二位都是老报人成舍我的部下，都在《世界日报》上要过笔杆子。还有一样：他们前半辈子都在北京，喝过豆汁儿，吃过扒糕，尝过北京有名的沙土。后半辈子去了台湾的台北，所以他们这本书总名《双城集》。

先打开太太这半本吧。

《故居何处》一下子就把您带到六十年前的老北京啦。夏天，院子里槐树上挂着浅绿色儿（应读“闪儿”）的“吊死鬼”（毛毛虫），树枝上叫着“知了儿”（蝉）。街上，羊肉铺外头挂着刚开膛的下水。海音这位大姐记性真棒，街名儿她一背就是几十个：什么梁家园、南柳巷，大概都是她走过百八十遍的胡同，仿佛还听报童儿们扯着嗓子喊《群强报》《小实报》呢。她津津有味地回想着骑驴打宣武门去逛白云观那趟，一路听着小贩的吆喊：“蛤蟆骨朵儿——小金鱼呀！”秋天，满市街是喷香喷香的糖炒栗子味儿。

可惜她记得的地方大概全改样儿，要不就没影儿啦。烤肉店倒是还在，原来它是家包子铺。反正我跟着这篇《故居何处》足足神游了一趟老北京。

在《闲庭寂寂景萧条》这一章里，她写起那年月的家庭生活，给三位婆婆当儿媳可真不易呀！家训是“要饱早上饱，要好祖上好”，另外，“吃是本事，穿是威风”。海音是日本大阪出生，北京长大的。她先看到一个三代同堂的台湾家庭。在《旧京琐记》里又写了北京的一个诗书门庭。她描绘了当年宅第的布局，还从她公公枝巢老人所著的《旧京琐记》里摘录了一些早年的礼数和京白的段落。当然，她也写了九十年代旧地重游的感受。去拜访冰心大姐那回，她特别记得忽然跳到桌上的那只大白猫。一句话，那趟她“过足了说京味儿的话，听京味儿的戏，吃京味儿的吃食的瘾”。

她一连喝了九碗豆汁！这位三十年代初的老记者还有一章专谈她的采访学，也谈了有关当时《世界日报》和社长成舍我的回忆，大可以给研究新闻学史的参考。在《为时代女性裁衣》那篇里，她讲了她一辈子的写作，她是从一九五〇年就一边儿理家，一边儿开始写小说的啊。她的《城南旧事》走红了海峡两岸。

我个人更喜欢她最后的几篇“纯”散文，谈“窗”、谈“门”，也谈“友情”。都写得生动自然，充满风趣，很能引人入胜。

说完太太这半本，该谈谈何先生那一半啦。

其实，他并不姓何。何凡是笔名，原名是夏承楹。为了写这一半，我翻了十一种内地所出的《文学家辞典》，怎么也没找到他的大名。原来他虽然出了二十五卷文集，但文学艺术占的比重不大。他和我同年，也是一九一〇年生人，按月份还小我几个月。他原籍江苏江宁，可是在北京出生的。一九三四年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就进了《世界日报》。（我是一九三五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就进了《大公报》。）他在报社除了用《玻璃垫上》这个题目写专栏之外，也编过副刊。去台湾之后，当上《国语日报》的主笔和社长。他真够得上是位十足的报人。他的文集主要论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以及金融市政——甚至体育，文艺部分占的比重

不大。也正因为这样,《双城集》里他的这些文章更加珍贵。

夏先生一辈子除了报业,他最热心的也许就是体育。他是台湾桌(乒乓)球协会和滑雪协会的常务理事,又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理事长。可以想象是位既勤于写作,又热心公众事业的文化人。

他们两位虽然经历近似,可是文章各有千秋。从文风来说,我认为海音是生活型的。她写来亲切熨贴,入情入理。夏先生则是文人学者型的。什么题目到他笔下就天南地北,广阔渊博,思路总介乎文人学者和专栏作家之间。瞧,他从“一根白发”就扯到美国总统,从“左手和右手”就聊起各地风俗和有关的迷信,甚至从“小学生与大书包”就比较起中国和美国的儿童教育来。

但这本《双城集》先后也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三十年代故都北京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当时在华北发行的《世界日报》和它的社长成舍我。这也很自然。这对耍了一辈子笔杆子的两口子说不定就正是在那个新闻岗位上结识的吧!